

## 蒙古帝国和火药武器——明治和现代的“元寇”形象

向正树 mmukai@mail.doshisha.ac.jp

原文为日文，翻译丁莉（北京大学）

### 1. 蒙古形象的变化

日本历史学界对于蒙古帝国的形象认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杉田正明通过发表系列著作<sup>1</sup>及通过传媒<sup>2</sup>刷新了人们心目中固有的蒙古帝国的形象，其学说的影响力广泛渗透。一个富有治理多元化社会的灵活性与管理智慧的新蒙古帝国形象，取代了传统观念中用暴行征服世界的刻板印象。另外，关于蒙古的陈腐学说，例如蒙古至上主义、九儒十丐、对藏传佛教的狂热信仰等也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那么，一般日本国民对蒙古来袭事件又是如何认知的呢？战前这一事件曾被利用来强化国家认同，今天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想在此对西洋画家矢田一啸（1859-1913）创作的全景画《蒙古袭来绘图》和最近中国旅游景点的全景图展以及日本漫画中的描写进行一个对比。

#### 矢田一啸和元寇纪念碑运动

矢田一啸是活跃在明治时期的西洋画家，创作了大量历史题材的全景画。他于安政5年（1858）出生于横滨，先是学习日本画，而后接触了西洋画，明治15年（1882）前后赴欧美学习，归国之后在上野全景画馆展示了自己创作的戊辰战争的全景画，受到人们的关注。

所谓全景画馆，就是让全景画面覆盖圆柱形建筑物的整个内墙面，供观众环顾欣赏的场馆。全景画馆起源于1794年的伦敦，而后传到欧洲和美国，矢田一啸在旅欧、旅美期间大概也参观过。明治23年（1890），日本第一家全景画馆在上野开业，随后在浅草、大阪、京都、熊本、富山等地也陆续建成。

九州的第一家全景画馆开在了熊本，矢田一啸在那里创作了西南战争的全景画。明治27年（1894）他来到福冈后，支持在博多建造元寇纪念碑的运动，为此，以元寇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的全景画。为了能够向世人展示矢田一啸的这些作品，人们在建有元寇纪念碑的东公园里也修建了一个元寇纪念全景画馆。<sup>3</sup>此外，矢田

<sup>1</sup> 杉山正明《大蒙古的世界——陆地和海洋的巨大帝国——》（『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陸と海の巨大帝国——』（角川選書227），角川書店，1992）；《忽必烈的挑战——通往蒙古海上帝国道路——》（『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朝日選書525），朝日新聞社，1995）；《蒙古帝国的兴亡》（『モンゴル帝国の興亡』講談社，1996。）

<sup>2</sup> NHK 特别节目《大蒙古》（1992年播放）等等。

<sup>3</sup> 是由佐野前励人（下文中提及）修建的，位于铜像前面的广场。大正中期，毁于一场暴风雨。太田弘毅编著《回顾元寇战争——纪念碑建设史料——》（『元寇役の回顧——記念碑建設史料——』錦正社，2009，p. 164。

一啸还运用自己掌握的解剖学的知识，改良了博多人偶的制作工艺。后于大正 2 年（1913）逝世。<sup>4</sup>

图1 矢田一啸 蒙古袭来图 “博多登陆” 本佛寺



图片源自 浮羽市官方网站>生活>历史·传统文化>本佛寺藏“元寇油画”

[http://www.city.ukiha.fukuoka.jp/imgkiji/pub/detail.aspx?c\\_id=71&id=22](http://www.city.ukiha.fukuoka.jp/imgkiji/pub/detail.aspx?c_id=71&id=22) 浏览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图2 「蒙古袭来绘词」前卷，图之七 宫内厅



<sup>4</sup>以上参考太田 2009 和西本匡伸等编著的《重生的明治绘画—修复后的矢田一啸《蒙古袭来绘图》》（『よみがえる明治絵画—修復された矢田一啸「蒙古襲来絵図」—』福岡県立博物館，2005）。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C5%8Dko\\_Sh%C5%ABrai\\_Ekotoba.jpg?uselang=ja](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C5%8Dko_Sh%C5%ABrai_Ekotoba.jpg?uselang=ja)  
浏览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 元军形象的变化——明治・现代日本与中国

从矢田一啸创作的这幅全景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元军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对于火药武器的运用（图 8），著名的《蒙古袭来绘词》（文末附图 2）中描绘了日本人与登陆博多的元军战斗的画面，矢田一啸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力，从而使得图画的构图更加有立体感。前面提到的汤地丈雄、高桥熊太郎所著的《元寇》里的插图也使用了《蒙古袭来绘词》中“铁炮”爆炸的场景<sup>5</sup>，下面这段文字更可以看出对火药武器尤为关注。

元军已占领中亚地区，将士身经百战、骁勇无比，秩序井然、驰骋千里，且进退自如，战法令人出其不意。特别是射毒箭、放火箭、打铁炮，其声音响彻云霄，如雷贯耳，被击之人不管如何刚勇，也会瞬间殒命。<sup>6</sup>

今天我们看到的描绘元军的画像、影像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元军所使用的先进的火药武器的描绘。特别是近些年来，有的作品中描绘的元军所使用的武器，其实尚未被完全证实当时已经存在。比如，在漫画家高木七彦的《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中就出现了一种金属管型火器（图 3-a 删减）<sup>7</sup>，但忽必烈时代这种火器是否存在尚未得到证实。高木七彦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缜密调查的基础之上独创新颖的内容。比如说，在他的作品里，唐朝是鲜卑系王朝，唐朝皇帝是作为“天可汗”君临天下的（图 3-b 删减）。<sup>8</sup>同时，他在作品里将蒙古帝国称作“乌鲁斯”<sup>9</sup>（ulus）（图 3-c 删减）也是基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所描绘的蒙古人，说的台词也好，军旗上的文字也好，多使用八思巴文字、维吾尔文字、蒙古文字等，有浓浓的异国风情（图 3-d 删减）。相比之下，矢田一啸的全景图画中，元军的军旗上基本上都是写的汉字，如“右军”、“东路”、“大元水师”等等。另外，高木七彦在刻画蒙古人形象的时候，虽然有时会表现蒙古人独特的价值观，但同时也会着重刻画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富于人性化的一面（图 3-e、f 删减），这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现代特点的表现方式，反映了全球化社会的多

<sup>5</sup>汤地・高桥，1893，p. 69.

<sup>6</sup>汤地・高桥，1893，p. 64.

<sup>7</sup>高木七彦《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第（『アンゴルモア 元寇合戦記』第 4 卷，角川書店，2015，pp. 37-38）

<sup>8</sup>同上，第 5 卷，2016，p. 106. 关于唐朝=“鲜卑系王朝”之说、唐太宗的“天可汗”称号等，参照了森安孝夫《丝绸之路和唐帝国》（『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講談社，2007，p. 138，164）

<sup>9</sup>同上，第 1 卷，2015，p. 54.



图 4-b 同 全景图



图 4-c 同 CG 影像



再就是，最近比较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大陆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游览区。1276 年南宋幼主赵昀（赵端宗）将行宫建造于崖门，后来元朝军队逼近崖门，通过海战将南宋一举灭亡。根据这一段历史，当地政府在原来行宫的位置上建造了现如今的主题公园。这一游览区是站在南宋的立场上建立的，公园最里面矗立着三座崭新的祠堂，分别是供奉杨太后的慈元庙，供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大忠祠，供奉南宋将士的义士祠。三座祠堂的建造资金出自于香港、澳门的居民乃至身在美国的华侨等（上图 4-a）。南宋反击蒙古的这场海战虽已成为历史，对战争的记忆却成为了祖籍在崖门的人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核心，即便自己身在海外、远隔重洋，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

在园内的一个建筑里，展示着最新创作的描绘南宋军队和元军大战的全景画。其中的一幅画描绘了元军使用大口径大炮发射炮弹的场景（上图 4-b）。在公园入口附近的一个展厅里，屏幕上滚动播放的 CG 影像再现了当时的海战情景，其中也有元军舰队一齐发射炮弹的画面（上图 4-c）。此外，园内还展出了当地一些文献资料的复印本，其中详细记录了海战的过程，包括元军使用大炮的情况。文献里面确实提到元军使用了“炮”，可是这里的“炮”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复杂。

## 2. 回回炮和火药武器——军事技术的东西方交流

关于火药武器在世界史上发挥的作用，早已有很多研究。15 世纪之后，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开辟新航路来到亚洲、发现新大陆美洲，其前提正是因为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以及火药武器的改良。此外，尽管游牧民族此前曾数次撼动和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历史，但相比农耕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却并不占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农耕民族率先引进了火药武器。不过，最早开发火药武器的是中国王朝<sup>10</sup>，但将其真正用于战争的却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

图 5 古阿拉伯语文献插图中所描绘的蒙古军队投石机 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MongolsBesiegingACityInTheMiddleEast13thCentury.jpg>

浏览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蒙古帝国疆域横跨欧亚大陆，曾经是人类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其最大的武器便是游牧民族所特有的组织力和机动力。但是在征服中亚花刺子模王朝，进攻巴格达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进攻的是壁垒森严的城池，于是在此过程当中

<sup>10</sup> Jerry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 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81-184; Needham, Joseph. *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7: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bert Temple 著, Joseph Needham 序文, 牛山照代译《图说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図説 中国の科学と文明』河出書房新社, 1992, 改訂版 2006, pp. 380-387 (原著 Robert Temple (Foreword by Joseph Needham), *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 Invention*, Patrick Stephens Ltd., 1986; Carlt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开始引进各种各样的武器，在远征中国南方的时候，还新建了水军<sup>11</sup>。现今已知的是蒙古帝国在进攻中国南方及花刺子模等地的过程中吸收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以及技工团体）<sup>12</sup>，包括军事技术。关于蒙古帝国是如何使用火药武器的，至今还有很多未解开的谜团，本文将从文献学及考古学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思考现今我们应当怎样去评价。

蒙古帝国在征服欧亚的战争中积极引进新的军事技术，例如在攻城时运用在伊朗改造的弹射式投石器——回回炮（上图5）等<sup>13</sup>。回回炮原本的意思是“投石机”，其主要用途是通过弹射巨大的石块以破坏欧亚大陆的城池常有的壁垒森严的城墙。根据《集史》记载，1258年，旭烈兀率领大军攻打巴格达的时候，从周围的山上采集巨石用投石机弹射出去，将巴格达的城墙砸开了大洞。这种能够弹射巨石的回回炮在巴格达战役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这场战役中蒙古军队还使用了火药武器，这个事实也不容忽视。根据《集史》的记载，蒙古军队所使用的火药武器都来源于中国。据《集史》旭烈兀纪所载，1251年，第四代皇帝蒙哥下令让弟弟旭烈兀远征巴格达时，从中国派遣了1000名能够使用三种武器的技术兵，根据他们所使用武器的不同，用波斯语称之为“Manjanīqī、Naftandaz 和 Charkhanda”<sup>14</sup>。在波斯语中，三者分别是“使用 Manjanīq 的人”，“投射 Naft 的人”和“投射 Charkh 的人”。Manjanīq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回回炮，Naft 原本是指石油，也有火药的意思，Charkh 大概是像火箭一样的东西。这三个词一直以来被理解成为“投射石头、石油、长箭”或是“炮手、火弹投射手、弓箭手”的意思。

关于蒙古帝国时代的 Naft 的用例，一般解释为“石油”。这在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语境下可能是正确的，可是在中国，火药作为武器使用并不亚于石油，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是否也是石油的意思就有待商榷了。例如，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录了一个乘坐中国帆船、投射 Naft 的士兵。对该游记进行翻译注释的家岛彦一是这样推测 Naft 的意思的：“用棉花将石头紧紧包住，然后在石油中浸泡之后

<sup>11</sup> 萧启庆《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汉学研究》第8卷第2期（16号），1990，177-200；向正树「蒲寿庚军事集团和蒙古海上势力的抬头」（『蒲寿庚軍事集團とモンゴル海上勢力の台頭』『東洋学』89(3)，2007，pp. 80-82）。

<sup>12</sup> 松田孝一「蒙古帝国确保工匠和管理的诸相」《平成12~13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1)从研究成果报告书碑刻等史料地分析蒙古帝国・元朝政治・经济系统的基础研究》（『モンゴル帝国における工匠の確保と管理の諸相』『平成12~1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礎研究(B)(1)研究成果報告書碑刻等史料の総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国・元朝の政治・経済システムの基礎的研究』（研究代表者：松田孝一；課題番号：12410096），2002，pp. 171-200）。

<sup>13</sup> 杉山，1992，p. 237；1995，p. 177

<sup>14</sup> 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 著，佐口透译注《蒙古帝国史》4（『モンゴル帝国史』4（東洋文庫235）平凡社，1973，p. 138）；拉施特主编，余大钧译《史集》第3卷（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 138；Фазлаллах Рашид ад-Дин，Джамӣ ат-таварӣх：кри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А.А. Али-Заде，Москва：Изд-во Наука，1965，Persian text，p. 22.

点燃”<sup>15</sup>。但其实 Naft 一词后来才有了火药的意思，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有对中国帆船的描述，而早在伊本·白图泰游记的七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关于“铁炮”的记录，因此我认为 Naft 应当是“火药”的意思。

图6 蒺藜炮弹（陶制炮弹） 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



另外，根据记载，在巴格达包围战中，蒙古将军布卡特姆率领的队伍在炮击企图突破包围的敌军时使用了“qawārīr naft”这种武器<sup>16</sup>。Qawārīr 在波斯语中是“烧瓶”、“瓶子”的意思，是阿拉伯语 qārūra(t)（玻璃瓶，药瓶）的复数形式 qawārīr，意思大概就是“将 Naft 填充在易碎的容器里”。如果 Naft 是火药的意思的话，那么“qawārīr naft”的意思就应当是在内蒙古和九州出土的那种陶制的火药炮弹了（上图 6）。这种炮弹如果是当年金朝华北地区汉人军队使用的武器的话，那么就和《金史》里面出现的“震天雷”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在攻陷巴格达的战役中，不仅是投石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震天雷”相似的这种火药武器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68 年至 1273 年，蒙古攻打襄阳期间，大元乌鲁斯的远征军首领有一位名叫埃里克卡亚的维族将军，他想要使用西域的那种力量强大的投石机，于是皇帝忽必烈就从伊尔汗国（旭烈兀的家乡）的首领阿八哈那里调来了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

<sup>15</sup> 伊本·白图泰著，家岛彦一译注《大旅行记》（『大旅行記』（東洋文庫 691）第 6 卷，平凡社，2001，p. 128; 184，注 163）。

<sup>16</sup> Фазлаллах Рашїд ад-Дїн, 1965, Persian text, p. 57.



这两个人（技术兵）<sup>17</sup>，最终大破襄阳城池。

中国那时虽然有火药武器震天雷，但却没有像回回炮那样强有力的投石机；另一方面，西域虽然有回回炮，却没有将其用来投射火药炮弹的构想。二者都有不足之处，而蒙古帝国则取长补短，使其融会贯通，可以说这样的灵活性和想象力才是蒙古帝国的真髓，使之能够构建起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

### 3. 两种火药武器和“炮”的两难选择

虽然在中国早已开始使用火药武器并加以不断改良，但蒙古帝国（元朝）时期将其大规模运用在战场上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这一时期火药武器的使用，相关记录在汉文文献中想必非常丰富。但是火药武器究竟是什么形状的，却依然难以推断。被认定是这一时期的火药武器文物中有下述两种类型：陶制炮弹和金属管状射击火器。但这两种武器又有几种搭配组合，汉语中哪些词是指这些武器（或组合）的，尚不清楚，这些都给研究造成了困难。

在汉语中自古以来使用“砲”（后为“炮”）这个字来形容火药武器。“砲”，原写做“礮”，指的是投射巨石的机械。火药武器出现之前，《后汉书》袁绍传中出现过这个字。石字旁表示意思，旁边的“包”表示发音（也有人认为是表示轰隆声），从金代到元代，可能都是用这个字来代指火药武器。从博多湾和伊万里湾里面发掘出的火药武器“てつほう（铁炮）”的汉语表记可能也就是这个“砲”字。不过同一时期的投石机（前文提及）又被称为“回回炮”。所以，不同的“炮”到底是指哪种炮，我们很难马上搞清楚。但是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再加上仔细分析文献中的用例，应该还是能够有所发现的，接下来我就想做几个假设性的考证。

#### a、陶制炮弹

所谓“てつほう（铁炮）”，是指将火药填充于直径 15 厘米的球型的陶制容器中用来引爆的装置。1281 年，蒙古军远征日本，四千艘蒙古军舰沉没于长崎县松浦市鹰岛海域。后来这片海域的海底中发掘出大量的甲冑、箭束，还有“铁炮”。由于海底发掘的文物外部被贝壳所覆盖，很难判断其原来的形状，另外金属文物的铁锈还会和贝壳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为了探明其原来的形状，需要使用具有高速、大功率摄影功能，可以实现 3D 立体成像的 X 光 CT 扫描仪。在鹰岛海域发现的“铁炮”里面还有残留的物质，对其进行 X 光 CT 扫描后发现，内部残留的是短条状的铁片和陶器碎片。铁片上有气泡，可以推断当时使用的是铸铁。随着火药

<sup>17</sup> 《元史》卷 128，阿里海牙传，p. 3125（中華書局）；同卷 203，工藝伝，亦思馬因，p. 4544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 2，丞相楚國武定公（阿里海涯），p. 33（中华书局）“九年，公請以西域礮攻樊城…”。

的爆炸，铁片和陶片一齐炸裂喷出，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在炮口附近发现留有纤维质的痕迹，可以推测这是导火线或者是其他有机物的内盖<sup>18</sup>。

忽必烈时代，不仅远征日本时使用了“铁炮”，其他关于元军灵活运用火器的记录也不少见。例如，据史书记载，汉人将军张荣的儿子—君佐，在南宋平定战中使用了火炮<sup>19</sup>。乃颜之乱中，李庭命令国军壮士持火炮夜入敌军之阵，“炮发，果自相杀，溃散”<sup>20</sup>。还有记载说大元在消灭南宋余党的崖山之战中，面对南宋的海军舰队，也讨论了是否先用“炮”的方案。虽有人建议用“炮”，但遭到了反对，原因是“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随后描写的战斗场景中提到“弓弩火石交作”，说明这场海战中也使用了火药武器<sup>21</sup>。

图7 巴斯巴文字大德2年铭铜火铳 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



<sup>18</sup> 今津節生「4. 长崎县松浦市鷹島海底遗迹出土品のX光CT調査」《蒙古来袭，元朝军船的启示》（「4. 長崎県松浦市鷹島海底遺跡出土品のX線CT調査」『蒙古襲来，元の軍船からみえてくるもの』（鷹島神崎遺跡国史跡指定記念シンポジウム要旨集），2013，pp. 287-300）。

<sup>19</sup> 《元史》卷151，张荣传，p. 3582.

<sup>20</sup> 《元史》卷162，李庭传，p. 3798.

<sup>21</sup> 《元朝名臣事略》卷6，元帅张献武王，中华书局本，p. 106.

## b、金属管型射击火器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蒙古帝国还广泛使用了金属管型射击火器，这种火器被认为是现代武器中枪和大炮的雏形。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被叫做“火铳”的这种铜制或铁制的武器，源自于宋代用竹筒制作的“火筒”，后来在中国有了独特地改良和发展，到了明朝得以广泛使用开来<sup>22</sup>。现今中国有超过十种“火铳”被认为是元朝时期的，收藏、展示于各个博物馆。此前，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全长 34.7 厘米、口径十厘米的铜火铳（上图 7）<sup>23</sup>，铳身上所刻的八思巴字铭文“大德 2 年”（1298）经专家考证属实。这样一来，它就取代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元代至顺 3 年（1332 年）的铜火铳成为现存最古老的火器。

这件铜火铳是在大元上都遗址附近的牧民家中发现的，可能曾经是守卫上都的部队的武器。忽必烈政权末期，成吉思汗幼弟后裔乃颜、哈丹发起的叛乱大大动摇了帝国统治秩序，大德 2 年这一年是平定叛乱后的第六年，大元仍然没有放松对蒙古东部地区的警惕，有可能曾在此地部署火器部队以防万一。

## c、在船上使用的火药武器

1984 年，在中国山东省登州港蓬莱古城出土了三艘古船。其中一艘残余船体长 28.6 米、宽 5.6 米，据考证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一艘长 32.2 米、宽 6 米的中等规模战船。随古船一起出土的还有石弹，“铜炮”，“铁炮”等<sup>24</sup>。如果说海战中使用了火铳的话，那么这就说明那时的中国就已经有了装备有火器的战船，这实在是令人震惊。

## おわりに

### 结语

本文以火药武器为中心，分析了蒙古帝国形象在日本的变化，又从军事技术这一视点梳理了蒙古时代的亚欧交流。关于蒙古帝国如何使用火药武器，有必要从技术史上进行考证，但本文关注的是，在对明治时期和现代日本的元寇形象进行对比时，火药武器是一个关键点。

汤地丈雄在《元寇》一书的结论中指出，中亚地区的土耳其斯坦等国家屈服在成吉思汗的铁骑下，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臣义士，而是因为他们的爱国之心不够。“我大日本帝国的人民”不光有北条时宗的英明决断和将士们的勇气胆识，更是因为

<sup>22</sup> 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p. 31, 53.

<sup>23</sup> 钟少异，齐木德·道尔吉，砚鸿，王兆春，杨泓《内蒙古新发现元代铜火枪及其意义》『文物』2004 年 11 月（总第 582 号），pp. 65-67+3plates.

<sup>24</sup>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p. 21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蓬莱古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图 20，41，图版 4.

有拳拳“爱国之心”，我们才能挫败强敌，向海外扬我大日本帝国之国威，向世界展示我日本男儿之英雄豪气。<sup>25</sup>”另外汤地丈雄为矢田一啸的元寇大油画的画集作了序，在序言中这样描述日清战争（译者注：中日甲午战争）后明治30年（1897）的形势：“天下形势乃东洋危机日益加剧之秋”，“如今虽然表面和平亲善，但战后的戒备又甚于以往”<sup>26</sup>。这样的描述充分反映了明治时期日本所处的状况，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日本要一边对抗欧美列强一边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这跟如今日本面临的情况也有些许相似。

蒙古来袭给欧亚大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段历史通过漫画、电视剧、电影等不同形式被不断演绎，今后是否还将以新的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呢？当今，日本所处的远东局势越来越不明晰，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海洋发展成为热门话题。我们回顾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明朝郑和下西洋600年后的今天，中国开始重新扩大自己的海洋力量。有学者认为从出动远洋舰队这一点来看，“郑和下西洋是蒙古帝国海洋政策的延续”<sup>27</sup>。不过，郑和下西洋没有影响到日本，而蒙古来袭则将日本的对马和博多等地变成了战场。漫画《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中描写的火药武器既是高科技的象征，也是日本对邻国的恐惧心理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不安，因为我们的邻国时隔730年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在海上重新开始崛起了，也许我有些过度解读了。

矢田一啸创作的全景图画夸张地表现了蒙古军的残忍，整个画面充满了对蒙古来袭的恐怖。但是，在《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中，虽然也有描写元军士兵争抢战利品的丑恶画面，但是同时也描写了日本人的背叛和忤逆无道（本来这个作品也与汤地丈雄、矢田一啸所创作的爱国主义作品不同）。对于火药武器的描写也不像再现宋元崖门古战场的CG动画那么大胆。但是，在描写敌人的时候（除了强调对方之不义，跟自己区别开来这一因素）往往会把敌人描写得过于强大。日本、欧洲、伊斯兰等的史料里面，古今中外的历史记录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也不光是蒙古军的形象。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怀疑持有核武器恐怕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总之，塑造蒙古军的恐怖形象，仅靠千篇一律的夸张描写已不再具有真实性，如今恐怕也只能通过描写新型火药武器才能强调这种形象了吧。

<sup>25</sup>太田，2009，p. 106.

<sup>26</sup>太田，2009，p. 128.

<sup>27</sup>《新编高等世界史B 最新版》（『新編高等世界史B 最新版』帝国書院，2002，p. 147）.